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奥巴马访亚插手中日关系与南海争端

据多维新闻网 11 月 8 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 7 日在白宫简报中称，奥巴马总统仍然致力于“亚太再平衡”战略，完善该战略仍是总统第二任期内最优先的议题。为响应地区各国日益增长的呼吁，美国将致力于在亚太营造出开放和透明的安全及经济环境；奥巴马总统将在随后于缅甸举行的东盟峰会上强调在亚太海事争端中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及国家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在简报中指出，奥巴马在东亚峰会等场合都将强调南海及海上安全问题，特别是美国对地区紧张局势及破坏外交前景行动的关切，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填海造地行为。奥巴马欢迎中日达成改善关系的四点协议，并强调美国将会努力为这种氛围创造条件。

美国更换朝鲜政策代表以破僵局

据多维新闻网 11 月 7 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 6 日任命美国驻韩大使金成担任朝鲜政策特别代表，以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并处理人权等问题。金成将与国务院朝鲜人权事务特别代表罗伯特·金紧密合作，共同推动朝鲜人权问题的改善。克里还任命金成担任负责日韩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金成于 2011 年 11 月出任美国驻韩大使，是首位任此职务的韩裔美国人，于上月底结束任期返美。他此前曾任美国国务院六方会谈特别代表、朝韩事务办公室主任等职。新上任的朝鲜政策代表能否真正让美朝关系缓和仍是未知数。

美国共和党大胜后欲就南海问题对华加码

据美国合众国际社 11 月 6 日报道，美国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仅自 2006 年以来首度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同时也保住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次选举结果显示美国选民对于民主党和总统奥巴马的不满。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拿下”美国国会两院之后，党内鹰派已经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更加强硬的军事政策做好了准备。参议院的共和党大佬们已经碰头，并着手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正考虑加强对乌克兰政府以及反“伊斯兰国”武装的援助。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甚至提出，要在南海“挑战”中国的“侵扰”。麦凯恩曾说，他就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废除关于预算的封锁。

美媒称美防长提出“区域拒止”战略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 10 月 29 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最近的美国陆军协会年度研讨会上表示，美国陆军应当改变目前的“远征战略”，利用美国军队在全球重要水道附近的陆上军事基地执行全球范围的“区域拒止”战略。此外，这一理论现已被整理成报告书，这或许将是美军未来战略转型的“新方向”。近年来，“区域拒止”战略已经让人耳熟能详，并且其一向被视为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基于反舰弹道导弹、远程防空导弹、反导系统进行军事干涉战略的一种简称。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这一建议最终变成美国新的军事战略，将标志着以“海空一体战”为表现方式的美国“全球进攻”战略的破产。哈格尔曾在今年十月中旬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发表了“跨领域拒止”的讲话，并建议部署陆基部队以阻止敌人海空力量的“跨区域进入能力”。

美媒称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犯下五大错误

据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10 月 16 日报道，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在该网站刊文称，美国目前在打击“伊斯兰国”这场最新的伊拉克战争中犯下的五大错误为：第一，如同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美国面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一样，美国夸大了“伊斯兰国”的威胁。第二，美国滥用了自身的影响力，对于局势干涉过多，而没有让土耳其人、约旦人、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团结起来遏制极端分

子。第三，没能确定明确的重点，打败“伊斯兰国”、推翻巴沙尔·阿萨德，继续孤立伊朗并阻止其核计划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美国没有面对盟友及他国与美国世界观及共同利益的差异。第五，美国的反恐承诺有余，落实不足。

重点关注

新一届国会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编者按：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大获全胜改变了美国国会之前的平衡局势。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主任詹姆斯·林德赛对于新一届国会对美国接下来内政外交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11月4日进行的中期选举改变了美国国会之前的平衡局势。如今美国共和党自2006年以来首度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同时也保住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主任詹姆斯·林德赛指出下一届的国会将会对伊朗核协议、主要贸易协议与防务开支等议题产生重要影响。

1.如今的局势会对奥巴马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他接下来的两年任期内，他真的会成为跛脚总统吗？

积极的局势是白宫与共和党执掌的议会达成合作协议，在税务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与防务削减等政策方面达成一致。对于奥巴马及白宫来说，他们的主要关切点在于在剩余的两年任期内能顺利执政并做出一些业绩，对于共和党人来说，他们的关切点在于显示自身良好的治理能力，为2016年大选铺路，减少其在2016年大选中面临的挑战。

悲观的局势是僵局将会持续。从本质上来说，总统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不会那么容易达成一致。共和党在2008年和2012年输掉大选时都没有妥协，他们为何要在赢得中期选举后进行妥协呢？归根结底，局面的发展还要取决于总统、共和党以及民主党三股政治力量的博弈：民主党是否会同总统站在一起？还是民主党选择与

共和党进行合作？这将决定特定领域的议题辩论以何种方式展开。

2、在伊斯兰国、埃博拉、对俄关系等议题上国会将如何影响总统的执政行为？

相对于强迫总统采取行动，国会更容易对总统的外交政策进行控制。在涉及国内政策时，总统不能在没有得到国会同意时擅自行动。但在外交政策方面，总统有很大的自由度。不同政党之间，甚至在一党之内，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会存在分歧。

人们目前对于中东政策，对于伊斯兰国，以及与以色列和谈问题的关注程度很高，中东局势对于奥巴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否介入某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也要参考国会的意见。即使共和党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支持美国对伊斯兰国采取强硬政策，但也有一些共和党领导人建议美国避免过多卷入中东问题。

奥巴马在伊朗问题上也面临着困难：在 11 月 24 日最终日期之前，奥巴马需要寻求国会的支持，减轻对伊朗的制裁以使其终止核能项目。如果国会不予同意并拒绝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奥巴马可能会用宪法给予他的权利擅自采取行动，而这又会引发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政治斗争。

在对于乌克兰进行政治援助的议题上，各方的意见相对来说是一致的，总统可能会在这个议题上采取更多的行动。

3、在防务开支与贸易方面的政策又将如何？

华盛顿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目前对于国防部的预算开支限制得过于厉害。现在挑战在于民主党希望放松对内政外交方面的防务预算，而共和党人的态度如何目前尚不明晰。

对于贸易问题，目前有很多猜测认为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将更倾向授予总统“贸易促进授权”(TPA)。贸易促进授权是美国国会批准政府签署国际贸易协定的特殊模式，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政府与贸易伙伴谈判、缔结国际贸易协定的意愿以及相关谈判的结果。如今人们谈论地最多的是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涉及到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国家。这项协议进行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如今陷于停滞。而问题在于，是否投票赞成“贸易促进授权”还有待于民主党的决定。

(文章来源：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

APEC 会议，奥巴马应对中美关系的新机遇

编者按：在奥巴马赴北京参加 APEC 领导人会议之际，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学者对于奥巴马总统如何能进行一个富有成果的中国之行进行了分析。

奥巴马在赴北京参加 APEC 领导人会议时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领导人继 2013 年 6 月加利福尼亚庄园会晤之后的首次重大双边会晤。虽然这一年多以来世界热点问题不断，但中美双边合作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学者对于奥巴马总统如何能进行一个富有成果的中国之行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

奥巴马应该同时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20 年前印度 APEC 峰会拟定的目标是在 2020 年实现亚太地区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当我们即将迈入 2015 年之时，发现这一目标还不能完全实现。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开放某些受到保护的部门，实现其贸易与投资自由还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一直以来，人们为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所做的努力成效非常有限，在这些努力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项协议涉及了亚太经合组织中的 12 个经济体。最近在澳大利亚完成的 TPP 部长会议使人们看到了协议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之内达成的希望。尽管还存在困难，尤其是考虑到日本的农业市场问题，奥巴马在这次行程中并不能为解决 TPP 谈判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什么成果，但在与其他领导人的一对一会晤中，他应该将这一议题作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的最主要任务。

另外一项奥巴马需要关注的经济协定就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在 2015 年第一季度之前就彼此的“负面清单”进行交换。奥巴马总统应当公开或在私下鼓励中国提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稍短清单并尽快与之促成实际的交易。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中美双边投资协议是相互联系的。中国害怕被遗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之外，故美国推进 TPP 谈判能有助于中国更积极地进行改革。此外，达成中美双边投资协议也是中国加入 TPP 谈判之前的重要一步。如果亚洲地区的大国能真正达成一项具有野心的贸易与投资协定，就能大大加速整个亚

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实现。

奥巴马应该分享美国自身经验以加深双边理解

有两种主流的观点——中国认为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论以及美国认为中国军力与经济实力增长导致的中国威胁论——正在使这两大国趋于对抗。为使如此重要的双边关系重回正轨，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必须利用这次 APEC 峰会提供的机遇来加深双边理解并公开澄清这些误解。

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转变会自然而然导致国家之间的紧张与猜忌。但是，冷战思维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壮大的当前。尽管存在经济摩擦——比如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问题，中国对于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任何一项旨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都不能在缺少中国或美国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繁荣。此外，两国在反恐、阻止核扩散、网络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反腐败与促进全球健康等关键领域存在着强烈的合作动机。

在国际政治上，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可以帮助弥合两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习近平主席最热衷于 NBA 篮球赛，他的夫人参与了盖茨基金会在中国关于抗击艾滋病与控制烟草的活动，他的女儿也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并致力于中美两国之间积极的文化与社会交流。奥巴马总统不应该以一种前律师的身份与习近平主席交流，而应该以一种非裔美国总统的身份。他应该更多地分享在美国的经历与他的个人成长故事，并探讨民主、人权、法律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奥巴马就可以向中国领导人与中国公众显示美国对于这些价值的追求并非出于对中国的不尊重，而是出于尊重、真诚与友好的目的。

双边关系只有在双方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提升

奥巴马此次赴京是他第二次访华，也是继庄园会晤之后两国领导人第四次面对面会晤。离开中国之后，奥巴马还将前往缅甸参加东亚峰会，并赶往澳大利亚参加 G-20 会议。以上活动都显示出奥巴马政府继续将亚太地区置于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在多边及双边情境下，奥巴马访华都会吸引广泛的关注。奥巴马政府希望在 TPP 多边谈判上取得进展，这也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政策”的重要支柱。

但是，在奥巴马此次中国之行中，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也无从回避。自从 2011

年秋天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中国官员一直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持警惕态度，虽然美国官员一再坚持再平衡政策不会将中国排斥在地区秩序之外，中国对于地区未来也有自身的看法，且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完全作用。同时，中国也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同样对这一概念保持警惕。

对于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说，挑战在于他们必须制定一项可以在奥巴马总统剩余任期内达成的议程并为此定下基调，尽量减少两国政策之间的分歧。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两国还没有开诚布公地进行交谈。

奥巴马政府将在剩余的两年内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以提升中美关系，这包括重新开启双边投资谈判协议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步骤。美国还打算与中国有关部门围绕深层的军事议题——包括海上领域的紧张关系、朝鲜核力量与导弹力量的发展、中美军事关系的更全面规则——进行坦率探讨。

这些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关键是两国能否对此给予同等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两国的合作。奥巴马接下来的一系列动作会为未来两年局势的发展提供一些暗示。

奥巴马应视合作高于竞争

美中对于地区与全球合作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但两国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生疏，紧张局势也在上升。两国关系已经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失和。其中的原由是多样和复杂的，也是理所当然和可预期的：两国对于世界秩序的观点不同，又处于上升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历史动态规律之中，双方对于双边与地区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正因为如此，两国领导人对此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的五十年，中美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2009年之前两国关系以合作为主，2009年至今两国关系以竞争为主。两国存在着广泛竞争，竞争领域包括外交、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软实力）、军事/战略，双边、地区并日渐涉及到全球领域。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管理竞争，避免使两国关系发展成为敌对关系，在一切可能的方面扩大两国的合作。考虑到一系列因素，这并不容易，双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共建合作的、而非敌对的未来。

（文章来源：11月4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埃

编者按：由于未能有效控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美国内对奥巴马的批评声日渐高涨，共和党人更是抓住这一时机对奥巴马进行口诛笔伐。在这场民主共和两党之战中，给人们生命健康带来现实威胁的埃博拉问题已然被政客们概念化，成为又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美国政治游戏。

随着美国本土接连出现 3 例埃博拉确诊患者、100 多人陆续受到医疗机构密切监控，曾经自诩为对埃博拉“绝对免疫”的美国近日逐渐陷入空前的焦虑。美国政府处置埃博拉疫情的举措也遭到媒体的猛烈抨击，疫情所引发的恐慌近来愈演愈烈。在无所不能“政治化”的美国，埃博拉问题政治化的倾向也开始愈加突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日益临近，任何问题在此时都会成为两党相互攻击的议题。由于未能有效控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美国内对奥巴马的批评声日渐高涨，而共和党人，更是抓住这一时机对奥巴马进行口诛笔伐。

10 月 17 日，奥巴马“钦差”克莱因的埃博拉总管任命，引来国会共和党人一片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8 日称，出任埃博拉疫情反应协调员的罗恩·克莱因现年 53 岁，分别为两任副总统担任过办公室主任。美国现任副总统拜登对这名前部下赞赏有加，“他是名久经考验的管理者，解决问题能力出众，值得信赖”。根据白宫的声明，克莱因将直接向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以及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顾问莉萨·莫纳科报告，预计他将不久开始工作，确保“各项努力得到合理协调，既通过检测、隔离和诊治国内埃博拉患者而保护美国民众，又不影响美国致力于遏制西非地区疫情源头的积极承诺”。尽管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应对埃博拉疫情并不只是医学的事情，我们现在需要的并不是一位埃博拉疫情专家，而是一位能够贯彻执行制止埃博拉疫情发展措施的专家”，但这显然不能平息外界的质疑之声。

令人尴尬的是，克莱因的出色履历并未给美国媒体留下深刻印象，后者显然更在意这名政府协调员“完全不具备医疗领域工作经验和传染病学专业知识”。美国福克斯新闻网 18 日说，克莱因被提名一事遭到资深共和党人士的炮轰，批评人士认为他根本不能胜任这一要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将矛头直指奥巴马政

府，批评其“面对埃博拉疫情爆发做出的回应一错再错。医生出身的共和党议员普莱斯批评说：“奥巴马在一个异常严肃的时刻表现出一副很不严肃的姿态”。共和党籍众议员墨菲认为，奥巴马的人选不是专业人士，而是长期以来的政治亲信，这令人失望。而共和党籍参议员亚历山大则通过“推特”发表留言，称克莱因“并非我想象中的合适人选”，他更倾向于让一名“对国会负责”的内阁成员担任埃博拉事务总管。对此，《华盛顿邮报》10月17日亦以“令人厌恶的埃博拉政治化”为题刊文，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管柯林斯近日发声“2010年埃博拉疫苗的研究经费是3700万美元，2014年锐减到1800万美元，如果经费没有被削减，研究院也许已经研制出了埃博拉疫苗”进行回应。文章称，柯林斯的议论首先招致了保守派的抨击。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国家卫生研究院等机构之所以研究不出埃博拉疫苗，是因为把经费浪费在无聊的项目上了。而自由主义者则抨击共和党人削减经费，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章指出，上述的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是“令人厌恶的埃博拉政治化”。在医疗研究上不能有党派之争，各方应该共同支持医疗研究。

但这显然仍非这场争论的终点。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起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奥巴马在应对一系列问题上表现不尽如人意，其支持率业已降至或接近历史低谷，而共和党正计划将民主党此次应对埃博拉疫情措施有限的局面扩大化（为未来的总统大选造势）。保守派战略家邦金更是指出，“共和党意在强调奥巴马政府应对埃博拉疫情不力，并将此与政府无能联系在一起，而此前白宫应对一系列危机的表现令人不甚满意，加之此次应对埃博拉疫情措施有限，似乎在进一步强调有必要换政府了”。

在这场民主共和两党的口诛笔伐之战中，不难发现，给人们生命健康带来现实威胁的埃博拉问题，已然被政客们概念化，成为又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美国政治游戏。

兰德公司报告：《提升美国的战略竞争力》

编者按：兰德公司最新出炉的一份《提升美国的战略竞争力》报告分析了美国

过去 13 年在战争中的经验，并提出了解决未来冲突所需要的条件。

此报告分析了美国过去 13 年在战争中的经验以及解决未来冲突所需要的条件。它解决了目前争论与现实中的一个脱节：即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因当前政府战略执行力不足问题而产生的美国地面力量角色问题。这种脱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没有对在 2001 年到 2014 年之间政策和策略制定者的见解进行系统地分析和搜集。这篇文章在未来国家安全战略执行的语境下，对这些见解进行了分析与延展，将这些见解置于未来的战略实施环境中（包括常规威胁与混合威胁），并识别了陆上力量与特种力量在与跨种类、跨部门、跨国力量合作中成功运作的关键要素。

报告旨在解决的两大问题：

一：我们能从美国过去 13 年的战斗经验中得到何种启示？

二：美国政府、美国的陆上部队与特种部队在未来的非常规、混合战斗中需要何种能力以实现与跨部门、跨国军事伙伴进行联合作战？

二战结束后至今的两大趋势：

一：陆上战争已经和对国家行为体的传统打击以及联合部队对非国家行为体的非传统战争逐渐分离，美国对于特种部队的依赖正在逐步增强。

二：当部队从实际作战中学习到了相关战术与运作经验后，有时无法将其相关经验应用到战略层面。

过去十三年战争中美国得出的七大经验：

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缺乏对战略艺术的理解和应用。

二：一个集成的军民组合是有效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必要而非成分条件。

三：军事行动发生在国家可能会对此进行干预的政治环境下，所以军事行动必须基于政治策略。

四：由于人的固有本性与战争的不确定性，技术不能替代对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历史知识的理解。

五：一旦采取干预措施，要对此制定计划，进行稳定操作以及能力建设，能及时采取相应转变，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镇压叛乱。

六：从成本收益角度看，塑造、影响和非常规操作可能是一种解决冲突的合理方式，它能避免更大规模、更昂贵的干预。

七：联合军事行动需要与非军事部门以及跨国伙伴之间的联合行动，这需要依靠结构的协调来实现机构、盟友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

建议措施：

一：美国的战略竞争力需要通过对非军事政策制定者进行教育以及修改美国军队的战略输出方式来得到提升。

二：军队应该建立规模较小，配置精良的专业化高效组织来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三：特殊作战力量与传统力量应扩大规模，在非常规与混合作战中实现无缝对接。此外，新的命令结构应该促进对于特殊作战力量的操作。

四：创新与多功能的人员配置可以使一支小规模力量更高效，但必须配置与人员发挥的创造性、承担的风险与任务的多样性相对应的奖励机制。

五：联合能力、服务能力、咨询能力以及其他应对非常规能力与稳定运作能力都应该被保存、被修正并用来执行当前的军事计划。

六：应该将平民专家配置到执行关键任务的团队中，并且在必要时将他们配置在制定战术信息层面以确保其能更好地履行职责。

七：美国政府应该提升内部人员对于联合作战的准备程度，并且通过一种内外结合的方式有效雇佣外籍军事专家。

（文章来源：美国兰德公司网站）

焦点分析

美国须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核心提示：中国的崛起可能是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面对的最大挑战，美国在今后数年要围绕中国考虑很多问题。目前只有极少数美国公众和决策者着眼于这一挑战。分析文章认为美国应该对这一局面做出改变。

已经有很多文章讨论过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回归以及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但是在美国政府和权力机构中，关于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还没有被充分地讨论。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以及美国公众必须直面这个事实：中国的崛起可能是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面对的最大挑战，因为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对于美国经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国的繁荣与美国的全球地位来说至关重要。

与前苏联相比，中国拥有更多的资源配置能力。不夸张地说，美国需要像应对冷战时那样来应对目前中国的挑战。情形的严重性已让决策制定者与规划者感到不安。

事实上，美国必须先应对以下四个严酷的事实：

首先，下届美国总统及其顾问们应该明白，对中国采取忍让政策的尝试现在被证明是失败的。2005年，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曾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希望中国能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亚洲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提出中美两国和解的政策以避免在世界历史中不断上演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悲剧。中国对美国这些政策的回应是更自信的行动与军事现代化的加速。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不愿意继续承认中国当下的路线，下一任美国决策者需要采取一种新的对华政策。

第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这个事实：他们在西太平洋地区传统的运作模式——依靠短程航空器、大量集中的基地与传统的海军政策——随着中国全面开发出导弹技术已经不再适用。美国军队需要打破在过去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军事采购与运作习惯，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国会与军事部门必须面对这样的调整：建设远程军事力量，而非单纯依

靠短程航空器；建造更多的潜水艇而非水面舰艇。对于国会议员与军火承包商来说，这种采购政策的改变不容易做出，但却一定要做出。就建设远程军事力量而言，新的美国空军远程攻击轰炸机项目使用了已经被证明可行的子部件，比如使用 F-35 战机中的座舱与作战系统。这样一来新的轰炸项目机在传统打击之外还能执行新的任务。与当下 80 到 100 架远程攻击机的数量相比，五角大楼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就建设海军力量而言，应在未来减少软弱无力的水面舰艇建设，加大潜艇舰队的建设。海军的计划是建设 48 艘目标攻击舰艇，这一数量远远不够，特别是考虑到由于中国的反舰导弹威胁使美国水面舰艇逐渐回撤在西太平洋的活动范围。而建设大型潜艇舰队可以承担美国政策调整后海军的大部分任务执行。国会以及军火承包商应将此视为一个契机，而非一个使国会头疼的问题。

最后，美国民众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曾经与苏联周旋了四十年，如今又卷入了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斗争中。考虑到美国需要动用的资源来看，中国是美国要面对的下一个挑战，也可能是最艰难的挑战。美国与中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使民众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变得复杂。自从 1812 年以来的 200 多年间，美国一直在与其主要的经济伙伴进行着安全竞争。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也使美国内部对于应当如何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争议不断，尽管如此，美国民众不得不接受由中国带来的挑战这一事实。

2016 的总统大选季马上就要到来，候选人将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他们会像以往一样忽视这个问题吗？还是会借竞选之际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大肆进行宣传？如今只有极少的美国公众与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中国问题，这一局面必须得到改变。

（文章来源：10 月 17 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奥巴马在变化中认识中国

核心提示：在同中国较量的过程中，奥巴马对中国的定位一直都在变化。现在奥巴马对中国的认识依然处于纠结和挣扎状态。

奥巴马总统 11 月将前往北京参加 APEC 峰会。在对奥巴马此次访华近一年的筹备过程中，中美（尤其是美方）竭力将彼此的矛盾和摩擦压至最低限度，通过决策层及时消噪释疑，所以当前的访问氛围相对积极。然而，相比 2009 年在北京的处子秀，奥巴马对于中国的定位已经不再是彼时拯救世界经济于危难、令他在世界政治方方面面都充满期待的国家。他想给中美一个定位，但又言辞闪烁、前后摇摆；他想给中国领导人言行一个定性，但又缺乏智囊和幕僚支持。现在的奥巴马，对中国的认识依然处于纠结和挣扎状态。

在同中国较量的过程中，奥巴马对中国的定位一直都在变化。2009 年访华前一周，奥巴马接受媒体访问时认为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在气候变化、经济复苏以及核不扩散等关键议题上，中美必须鼎立合作，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实现目标。2009 年 11 月 17 日，奥巴马在北京记者会上强调了美国“多边合作伙伴”，称中国不是对手，可以帮助解决伊朗核和气候变暖等世界性挑战。两年前连任竞选辩论期间，奥巴马可能因选举需要，对华定性有所升级。在和竞选对手辩论中国的崛起以及对美国形成的挑战时，他说：“中国是对手，但只要中国按规则行事，就也是国际体系中的潜在伙伴。因此，美国政府要促使中国按规则行事。”为何向中国强调规则？这和奥巴马在第一任期接触中国时遭遇的挫折有关。

奥巴马以“变革”口号入主白宫后，在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暖等新挑战的大背景下，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提出“中美国”的说法，以此将中美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帮助全球共度难关。弗格森这样说也是为了让白宫更加重视中国的角色，避免被中国抛弃。但是，中国政府、学界对这一提法表现冷淡，所以它和“中美共治”提法一样，慢慢淡出了舆论视野。作为一名自由派理想主义者，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一位“好人”角色。对于中东，奥巴马上任后没有急于推广美国价值观，而是反思中东政策，以谦逊和互敬的原则向阿拉伯国家伸出了橄榄枝，但结果还是遭遇失败。

对于中国，奥巴马上台时同样寄望很高，希望能够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等方面加大与中国的合作，但是，接踵而至的谷歌事件、人权、西藏以及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摩擦等问题，让两国关系经历了大幅波折。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主导下的对华互信跌至最低点，直至 2011 年中国领导人访美。白宫官员曾

透露，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充满期待，非常愿意和中国合作，但结果事与愿违。在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之际，奥巴马紧急调整对华政策，安排副总统拜登领导对华关系，并逐渐同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庄园习奥会正是在这种交好基础上实现的。

加州习奥会时，奥巴马在“伙伴”定位中加入了“平等”二字。奥巴马说：“中国若成功和平崛起，将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并使得中国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双方可以共同应对许多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的全球性挑战。”笔者分析认为，奥巴马提出“平等”定性中美关系，有两个意思蕴含其中：第一，回应习近平主席当时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首次提出的“太平洋足够大，足以容得下中美两国”说法，强化他当时的外交团队开始宣传的“美国系太平洋国家”的地位。只有双方平等对待彼此，双方才可能相安于太平洋两岸。第二，符合同习近平主席庄园会晤达成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共识。“平等”可以说是奥巴马对这种新型关系的第一个直观理解。

但是，“平等”并不意味着美国心甘情愿同中国分享在地区的话语权，因为美国还得顾忌或依赖亚太盟邦，维持在亚太的地区霸权。在中国强势引领地区及全球事务的趋势下，美国决策层的亚洲政策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定性都会发生变化，人们好奇依然对中国抱有某种期待的奥巴马下月前往北京时会如何评价中美关系。

（文章来源：2014年10月14日多维新闻）